
簡介英國教授 Colin Sparks 其人其文 ：一位左派知識份子的深沉吶喊

林麗雲*

編按：Colin Sparks 是英國傳播學界著名的左派陣營健將，他的新作〈歐洲共產主義滅亡後的媒介理論：為何東、西方的舊模式都無法解釋〉在本期《文化傳播》發表，為本刊增色不少。為使各界約略明瞭其人其事，特商請曾受教其門下的林麗雲女士撰文導讀，並簡介其學識深宏之恩師。

* 英國西敏斯特大學傳播暨資訊研究中心博士，在攻讀博士期間，曾選修 Sparks 教授的課程，並多次針對當代傳播問題向其請益。作者現任輔仁大學新聞傳播學系助理教授，主要的研究興趣包括：傳播社會史、傳播政治經濟學、批判理論。

廿世紀值得探討的傳播學理與大師頗多，但西方學界能將視野伸向東歐的仍舊十分有限，被冠以左派旗手名號的 Colin Sparks 教授為本期《傳播文化》寫的大作，分析了東歐共產國家政治轉型中媒介體制的演變情況，並據以批判居於主流的「四大報業理論」，全文見解精到，論點詳瞻，而且自成一體；但若放在他等身的著作中來看，該文只是一個小小的註腳，尚不足以顯現其完整的思想體系。由於他在學術上值得引介的面向甚多，因此，本文嘗試對他作一較宏觀的介紹，讓讀者對其個性與思想有較多的了解，如此，再接著研讀他的文章，便容易知其然（知道他的觀點），也知其所以然了（明白他為什麼這麼說）。

Sparks 承襲了西歐自啟蒙運動以來所發展出來的一些價值（如理性、平等、自由、解放等），反對任何戕害這些價值的勢力，並且深信：人類藉由其理性與行動，終將掃除種種不合理的力量，達到真正的解放與社會的進步¹。

Sparks 認為，當代社會的根本問題之一，是資本主義的邏輯破壞人類理性，侵入公共生活，製造虛假意識，並且一再使階級的不平等加劇、重演²。在解答及解決這些棘手的問題上，Sparks 相信，雖然馬克思主義曾受到多方的誤用與誤解，但它仍是強而有力的理論架構，因為馬克斯主義能解釋資本主義的邏輯，並能提出解決的方案（Sparks，1998a：xi-xiii）。

基於這樣的理念，Sparks 除了曾積極地參加社會及勞工運動

¹ 關於啟蒙運動以來西方的「現代性」（modernity）——即西方文化中的特質及價值——見 Hall（1992）等人編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一書各章，尤其是其中 Hamilton 所寫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一文。

² Sparks 在其 1998 年的代表作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Mass Media* 中的緒論部份，曾明白地宣示其學術及政治立場。

³，在學術上則投效與他立場相近的研究單位⁴——西敏斯特大學的傳播暨資訊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mmunication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CCIS,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⁵）——作為論戰的基地。由於該中心是英國傳播政治經濟學的重鎮之一，英國傳播研究的批判大將（如 Nicholas Garnham⁶, James Curran⁷ 等人）曾齊聚一堂，共

³ 在政治活動中，Sparks 主要參與英國「社會主義工人黨」（Socialist Workers' Party）。他早年曾擔任該黨的機關報之總編輯。雖然後來 Sparks 以學術工作為重，他仍續參加該黨活動。例如，Socialist Workers' Party 在 1997 年假倫敦大學校區舉辦一系列的演講及座談，探討資本主義對當代生活的影響、當代左派學者的學說與評論、左派的路線與未來，Sparks 即為講員之一，可說是英國傳播文化研究中具有社會實踐力者。而這種社會關懷與實踐，正是早期英國傳播文化研究的重要遺產（Turner, 1996；劉平君，1999）。例如，二次大戰後初期英國傳播文化研究的重要奠基者，如 Raymond Williams 等人曾創辦《新左派評論》（New Left Review），並投身重要的社會運動；他們也曾共同推動媒體的改革，發表改革宣言（Curran et al., 1978）。

⁴ 以教育背景而言，Sparks 曾在薩樹克斯大學（Sussex University）及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ty）求學，最後在伯明罕大學（University of Birmingham）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ontemporary Cultural Studies, CCCS）並獲得博士學位，曾受教於文化研究的大師 Stuart Hall。有趣的是，在八〇年代左派間的論辯中，Hall 等較重視意識型態者，曾與 Garnham 等較重視經濟基礎分析者，展開激烈的爭辯（Garnham, 1986；Hall, 1986）。在兩派的對壘之中，Sparks 雖出身自 Hall 的「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卻長期（自 1974 年至今）在 Garnham 主持的「傳播暨資訊研究中心」（CCIS）旗下工作。同時，他也曾為文批評 Hall 忽略經濟基礎及階級的分析（Sparks, 1992b）。從這些跡象大致可看出 Sparks 的立場與傾向。

⁵ 該大學在 1992 年改制之前是「中倫敦科技學院」（Polytechnic of Central London）。

⁶ 在 1997 年以前，Garnham 一直擔任 CCIS 主任，是該中心主要的領導人。1977 年發表〈For A Contribution of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 Communication〉，嚴厲地批判化約的馬克斯主義者及意識型態論者，認為這些取向忽略

商大計；因此，Sparks 有機會與他們合作，完成重要的傳播研究，並出版成書⁸。該中心定期出版學術季刊《媒介、文化與社會》（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是國際重要且著名的學術期刊，Sparks 即係編輯之一。

在 CCIS 批判性陣營的支持下，Sparks 站穩了學術的立場和據點。在八〇年代，他主要關心的是資本主義的邏輯下，英國大眾文化（popular culture）的產製過程；他的研究對象是大眾化報刊（the popular press）。其可能的原因是英國報業受到資本主義的影響，遠比公共電視受到的衝擊還來得深（Sparks，1992a：282）⁹。Sparks 在分析中指出，二次大戰以來，英國報業已成為資本密集的產業，在資本不斷集中及壟斷的情況下，報業不斷地兼併，結果所有權集中在少數幾家報團手中；這些報團不僅控制了言論的市場，也與相關產業結合起來，掌控了社會權力。其次，Sparks（1991）指出，

了傳播文化的動態過程與深層結構（Garnham，1986）。這篇文章確立了他個人的研究取向，也影響了 CCIS 日後的走向。

⁷ Curran 是英國批判傳播研究的重要人物之一。他曾大力撻伐右派的自由報業理論（Curran，1991），並與 Jean Seaton 合作，用左派的觀點，重寫英國的傳播史（Curran and Seaton，1997）。他後來到倫敦大學金匠學院（Goldsmith College, University of London）擔任傳播系教授兼主任。

⁸ 例如，Collins et al. (eds.) (1986)；Scannell et al. (eds.) (1992) 等。

⁹ Sparks 及 CCIS 的成員（如 Garnham，1986；Scannell，1991；1992）認為，英國公共電視（即 BBC）較能實踐哈伯瑪斯所謂「公共領域」的精神：在所有權方面，BBC 屬公共所有，不屬於任何政黨及私人；在播放方面，BBC 在沒有歧視的基礎上對全國民眾播放，因此具普遍性（universal）的色彩；在營運方面，BBC 較不會受到商業邏輯（如成本、收視率及廣告營收等）的直接壓力，因此能製作出高品質的節目（如發人深省的紀錄片、新聞節目、辯論性的節目）。因此，CCIS 的成員堅決反對公共電視商業化，雖然 BBC 被批評為菁英取向、官僚習氣，且效率不足（Keane，1995）。

這些報團為了區隔社會中不同的市場，針對菁英階級發行「重品質的報紙」（quality papers），如《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大小為四開，裡面有較多公共議題（如政治、經濟）的報導與討論，其讀者是英國人口金字塔的頂端，僅佔報紙讀者中的一小部份（僅約百分之三），且大多數（八成五）屬於中、上階級¹⁰。另一類報紙則是針對廣大的勞工階級所發行的大眾化報紙（popular newspapers），如《太陽報》(The Sun)，為八開小張，囊括大部份（五成以上）的讀者，其中絕大多數（七成六以上）屬低階級¹¹。大眾化報紙的編輯與記者為了刺激發行量與廣告量，會蓄意砍掉嚴肅的內容，誇大輕鬆有趣的部份，再加油添醋，以「火辣煽腥」為賣點；一般讀者在少有選擇的情況下，只能閱讀這些內容，但是從中他們無法了解其切身相關的議題，也就較沒有能力參加公共討論，表達其立場。因此，Sparks 認為這種大眾化報業根本無法實踐「公共領域」的精神（Sparks，1991；1992a）。

由此可知，關於大眾文化方面，Sparks 關心的重點乃是，資本主義的制度下文化的產製過程及其與社會權力（特別是階級）的關聯。他的取向與部份文化研究者（如 Hall 與 Fiske）的有所不同。例如，Hall（1988：140-1）認為，當代社會中，除「階級」因素外，其他多重的因素（如族群、性別、青少年等）也會形塑大眾文化。但是，Sparks 並不完全同意這種說法。Sparks 認為：正因為資本主義的社會及傳播文化（如大眾化的報紙）仍是階級分明，所以「階級」是研究上最重要且不可或缺的面向（Sparks，1992b：33-4）。

又例如，文化研究者 Fiske 著重文化消費的層面，認為人在消費

¹⁰ 英國報業發行情況係 1989 年統計資料，引自 Sparks(1991):62。

¹¹ 同前註。

中可以作選擇而推翻了商品的邏輯，也可以藉由解釋文本來產生與文本相反的意義，更可以產生愉悅、展現權力、建立自主性（Fiske，1989：24）。對於這種說法，Sparks 也持保留的態度。Sparks 認為研究者必須先分析文化產製的過程，才能真確地了解大眾的消費經驗（Sparks，1992b：36-7）。所謂的「愉悅」可能只是生產者所刻意創造出來的「幸福感」，是虛幻的，讓人忘卻真實生活中不合理的現象，因此不會起而抗爭，也因此讓種種的不平等一再地被複製。Sparks 對於英國大眾文化的這些討論與爭論，可視為其在八〇年代主要的研究場域。

到了九〇年代，雖然 Sparks 不改旗幟鮮明的批判立場，但他的研究似乎有所轉變。他的研究版圖擴大了，範圍從英倫三島的大眾文化，推展到東歐、前蘇聯及亞洲等地的政治轉型，並兼及傳播文化在全球擴張的歷程。他的論戰場域也似乎更開闊、更宏觀；他持續與各門（如傳播學、社會學、政治學或哲學）、各派（左派、右派），展開精彩的論辯對話。其間，Sparks 掄起如椽大筆，廣向主流論述宣戰；他發射紙彈（文章），力戰群雄，並且接招拆招，為他所信奉的理念奮戰不懈。他還風塵僕僕，奔走各方，發表演講、參與研討會，也著手籌劃國際性的研討會¹²。十年間，Sparks 釋放出無比的能量，其生產力與生命力也達到了一高峰。也因為 Sparks 在學術上的耀眼成就，一九九七年榮獲傳播學教授的頭銜

¹² Sparks 曾多次赴東歐參加研討會，並與當地重要學術研究者（如波蘭學者 K. Jakubowicz, 斯洛伐尼亞的學者 S. Splichal 等）有所聯繫，也曾多次合編重要的書籍。他也十分關心亞洲民主政治的發展，多次到日本、香港演講、參加研討會。他也曾兩度來台灣，參加中正大學舉辦的「全球化傳播時代中，國家及在地文化產品的生產與消費」研討會，發表「超越國家政治：全球性公共領域的興起？」一文，也曾應中華傳播學會邀請，發表演講。目前，他正計劃以「媒體與民主化」為題，預計在 2000 年舉辦一項國際性的研討會。

（ professorship ），象徵了他的學術地位所受到的肯定。

然而，弔詭的是， Sparks 會發憤為文，立言立功，與其說是為了學術世界的功成名就，不如說是一個左派知識份子處身世局變遷之際，面對左派岌岌不保的危機時所發出的深沉吶喊。

自八〇年代末期以來，西方馬克斯主義的合法性受到質疑，因素之一是蘇聯及東歐的共產政權解體。當時，在歡欣鼓舞的氣氛中，人們翻過柏林圍牆、超越先前障礙、焚燒鐮刀鐵鎚旗、拉倒馬列神像，高喊共黨下台，要求開放選舉。這些歷史變遷似乎意味著馬克斯主義的破產，無法通過歷史的檢驗。右派的學者認為，根據馬克斯主義所建立的蘇維埃政權過去具有象徵性的意義，它曾是美國資本主義制度之外的另一種選擇。但是，這些政權根本不合乎人性，反而會帶來極權統治，也會自取滅亡；日後，這些地區也將朝向美國的模式，並在自由化潮流中與世界各地區整合起來（ Fukuyama ， 1992 ）。右派學者 Fukuyama 甚至高呼「歷史已走到盡頭」，「意識型態的對立已成明日黃花」，「未來人類的出路即是美國模式的（經濟上）自由（政治上）民主（ liberal democracy ）」。當這種右派的聲浪響徹雲霄的時候，左派份子只能黯然神傷，沉默以對。他們頂多只能如左派的歷史學家 Hobsbawm （ 1994 ）一般，一邊憑弔社會主義的逝去，一邊警告：即使資本主義當道，還是會有結構性的矛盾與經常性的危機。有的學者（如 Bauman ， 1992 ）則鑒於社會主義的計劃已告失敗，宣稱人類將處於「後現代」的狀態，其中充滿「不理性」、「不確定」與「偶發」（ contingency ）的因子。

因此，九〇年代西方學界的鮮明景象之一，是右派勢力高漲、左派卻士氣消沉、眾神噤口。這種情況，對左派的死忠者而言，真是情何以堪。但是， Sparks 毫不懷憂喪志，仍一本初衷，堅信左派的理論架構在今世猶有崇隆的地位。因此，雖然，古典馬克斯主義在大鳴大放的「右派」及「後（ post-）派」氣焰下，似乎顯得不合

時宜，Sparks 卻仍高舉左派大旗，頗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氣概，企圖為左派延續香火。

在策略上，Sparks 運用理論的思辨及實證的證據，來挑戰主流論述，並破解種種迷思。例如：主流論述刻意把蘇維埃政權的「殘暴」與「殘破」，與馬克思主義劃上等號，Sparks 奮力破除這種迷思。正如他在新作〈歐洲共產主義滅亡後的媒介理論：為什麼東、西方的舊模式都無法解釋？〉所指出的，長期以來，由於冷戰的關係，世人不了解東歐地區的情況。例如，對當地媒介的了解，主要只是根據 Schramm 等人（1963）的經典之作《四大報業理論》（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把東歐共黨政權下的媒體視為馬克斯主義的具體實踐。但是，Sparks（1998a）反駁說，Schramm 等的理論是產生在冷戰時期，當時反共（共產主義）及反馬（馬克斯主義）已成了美國的國教；在這種氣候下，Schramm 等的理論並非基於實證的基礎，而是基於反共、反馬的價值判斷；事實上，東歐各國根本沒有 Schramm 等人所稱的「蘇維埃共產報業」。Sparks（1998a：14）並進一步從左派的立場，提出相對的解釋指出，蘇維埃政權所實行的是「國家資本主義」（state capitalism），即控制「黨國機器」的統治階級也會控制社會中的資源（如傳播資源），並藉由剝削被統治者，來不斷地為自己累積資源；這些政權在根本上違背了左派所奉行的民主解放的原則，他們並沒有實踐馬克斯主義；因此，世人無須因為對蘇維埃政權失望，而連帶失去對馬克思主義的信心。

另一個例子是：主流論述把經濟的自由化與政治民主化，劃上等號。Sparks 又力圖廓清這個迷思。他以東歐為例說明：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部份政治運動者及學者常呼籲國家要解除管制、要退出「民間社會」，並鼓勵「私人部門」（如民間企業）的發展；他們也呼籲，未來政治轉型應以美國的政治制度，亦即「自由的民主政治」為未來追尋的典範；在媒體改革方面，也應朝向美國的「自

由報業」模式——開放私人擁有媒體，以市場的競爭來確保意見的自由流通¹³。對於那些人的說法，Sparks 有所批判。他指出，美國所實行的自由主義，只是一種「資產階級的民主」（bourgeois democracy），也就是說，社會中由少數的菁英階級控制社會的資源、主導國家的決策，但勞工及弱勢團體卻缺乏參與的管道，他們的權益也沒有受到充分的保障¹⁴。在這種制度下，媒體是由少數資產階級控制，一般人很少有近用的管道¹⁵。因此，Sparks（1994）指出，在資本主義下，經濟上的自由化不僅不能促進民主政治，有的時候還可能會限制民主生活的發展。

Sparks 也以他在東歐所進行的研究說明：為什麼經濟上的自由化與政治上的民主化，不一定有必然的關係。在這些地區，經濟上的自由化是政治轉型的重要面向之一；在這個過程中，昔日的統治階級會運用在社會上的優勢，把政治資本轉變為經濟及文化資本，所以能繼續累積豐厚的資本（Sparks，1998a: 71-106）。具體而言，這群菁英能在脫去了共產黨的舊袍後，立即換上西服，開著世界頂級的名車，進出國際酒店，與各國名流觥籌交錯。相對地，原先的普羅階級卻變成徹底的無產階級了；許多人不只失去原來在國營企業的工作，也失去了社會福利的保障。因此，Sparks（1998a:104）指出，在政治轉型的過程中，社會中權力結構並沒有大的改變，且多數人殷殷期盼的民主解放也遲遲沒有到來。

Sparks 所破解的第三個迷思，是一類忽略歷史性及結構性的「全

¹³ 關於東歐各國政治改革的歷程，見 Sparks（1998a），第五章。

¹⁴ 例如，C. W. Mills（1963）及 A. Giddens（1973）分別分析美國及英國社會，指出這些社會的權力是由少數菁英所掌控。

¹⁵ 英國文化研究的先驅大師 R. Williams（1962）也指出，「父權主義的媒體制度」是由統治者決定該說什麼，「商業的媒體制度」則是什麼能賺錢就說什麼。

球化」論述¹⁶。早在七〇年代左派學者（如 Schiller，1976）曾針對跨國間資訊流通的問題，提出了「文化帝國主義」的概念，指出強權國家（主要指美國）藉由軍事及經濟上的優勢，把意識型態的文化產品傾銷到其他國家，結果這些國家失去了文化的自主性，也更加依賴強權國家。到了一九九〇年代，隨著冷戰的結束，美蘇陣營對立的消逝，再加上自由主義思想及機構（如 GATT 及 WTO 等）的推動，以及新傳播科技（如衛星、網路等）的進展，於是跨國公司能以全球為規模，針對各地的特質，加以運籌帷幄，並作職能區分（Castells，1996：72）。對於這種新的現象，學界提出「全球化」的概念，闡明當代跨國性的傳播已超越「國家」的界線，堂堂進入以「全球」為單位的境界了。其中，部份學者（如 Robertson，1992；Waters，1995）受到後現代主義思潮的影響，提出「全球化文化」的概念。他們認為，因為各地文化有其自主性，全球資訊流通下所產生的文化不是單一的，而是異質的、混雜的、不確定的。Sparks（1999）認為，雖然這種說法點出了全球化的結果可能各地有異，或看似矛盾，但是在歷史的過程中，各地區還是都受到帝國主義不同層次、不同程度的影響。Sparks 指出，如果研究者忽略了帝國主義的影響，則在學理上可能無法解釋各地文化形成的因素，同時在政策上也可能會忽略來自中心地區的影響，於是各地區的人們不再對跨國企業的文化侵入產生防衛機制，結果他們可能失去更多的自主性。

另外，還有一部份的學者（如 Keane，1995）提出「全球性的公共領域」（the global public sphere）的概念。他們主要著眼於跨

¹⁶ 除了 Sparks 所批評的兩類「全球性」的論述外，還有一部份的學者（如 Golding and Harris，1997）還維持批判的基調，用國際政治經濟學的途徑分析資本在「全球上」流動與集中的過程。對於這一派學者，Sparks 則抱持較認同的態度（Sparks，1998c；1999）。

國性的傳播媒體（如 CNN，BBC，NET 與 Star TV 等）對重要事務的報導；他們認為這些報導大大地提高了國際事務（如柯林頓緋聞、南斯拉夫的內戰、中共對法輪功的政策等）的可見度（visibility），讓各地的閱聽大眾能目睹權力的角逐過程，甚至參與討論。對於這種說法，Sparks 也指出其限制。他指出，哈伯瑪斯所提「公共領域」概念具有「普遍性」（universality）及「平等性」（equality）等特質；但是，並不是各地區、各族群、各階級的人都有平等的權利與機會，來接近及使用國際性的媒體。Sparks 又說，這些使用者具有某些共同的特質：他們大部份是白男人、來自北美或西歐，通曉英語、受過高等教育、位居中上階級、遊走大都會之間，會用也用得起新型的傳播媒介（Sparks，1992a:290；Sparks，1998b）；一言以蔽之，他們是國際社群中的少數精英階層，並不代表各地的人都有普遍及平等的機會參與其間。因此，Sparks 強調，如果過度把國際傳播媒體的效能給浪漫化了，結果可能會對國際傳播媒體抱持正面的看法，而忽略國際社會中結構上的不平等，並且進一步會一再地複製、加劇這種不平等的結構。

由此可知，Spark 特別關注社會（包括全球、區域及國家等）中的權力結構問題，因此會從左派的觀點，來挑戰主流的論述，剖析當代傳播現象的深層結構，並破解種種迷思，為左派在當今之世找到定位與發言權。Sparks 所提的觀點值得我人思索、鑑鏡的地方不少；舉其犖犖大者，至少有三：

首先，長久以來，左派的思想在台灣的基礎甚為薄弱。在日據時代，雖然有少數的台共份子曾經稍事活動，但是不旋踵即被逮捕與覆滅（盧修一，1989）。到了五〇年代，在國民黨政權「反共抗俄」、「反攻大陸」的意理下，左派的思想更在「白色恐怖」的鎮壓中被連根拔起。之後，由於台灣在政治及經濟等等各方面依附美國，美國製的知識即不斷地在台灣的學術界中複製與加工（程宗明，

1998；王洪鈞，1993）；例如，Sparks 所批判的「四大報業理論」一直就是我國新聞教科書中的重要內容單元¹⁷。但是，因為這些知識的產製背景是冷戰時期，這些知識不但具有特定的目的與解釋的架構（Simpson，1994），而且經常忽略社會權力結構的議題¹⁸。因此，引介左派 Sparks 的觀點，將有助於我們反思現存的理論，並在反思的基礎上，發展出更適切與多元的理論體系。

其次，在與理論相對的現實世界中，因為台灣的傳播文化身陷在「群雄環伺」、「危機四伏」（指跨國企業亟欲染指台灣，而台灣的媒介集團也亟欲伸展到人們的「生活世界」）的情況，Sparks 對傳播權力結構的分析，有助於讓我們觀照自身所處的內外環境。就與國際社會的關係而言，長期以來，台灣深深地依附在國際強權之下（陳玉璽，1992）¹⁹；職是之故，台灣的傳播文化也受到強權國家的影響（程宗明，1997）²⁰。這種情況，正如 Sparks 所言，雖然本地的文化未必與強勢文化如出一轍，但是強權文化仍可能成為本地文化的重要部份；明顯的例子，如電影「鐵達尼號」在台的賣座，「哈日」商品的持續發燒等；潛在的影響，則如生活方式及文化價值觀的改變。這也正是 Sparks 所說「帝國主義的文化結果」（Sparks，1999：96）。未來，這種來自「中心地區」（指 Wallerstein「世界體系理論」中資本與技術較密集的地區）的影響，可能還會增強而不會減弱，因為在台灣加入 WTO 的過程中，本地的

¹⁷ 例如，李瞻（1986）。

¹⁸ 關於美國主流典範的討論，請參見以下文章的討論（Gitlin，1978；Golding and Murdock，1980；張錦華，1994；林麗雲，1999）。

¹⁹ 陳玉璽（1992）把台灣的發展型態稱為「依附型的發展」（dependent development）。

²⁰ 陳光興則用「帝國主義的文化」的概念說明這種文化現象（出自陳光興在1999年7月10日在一場論文討論會中的說明）。

傳播資訊事業將與全球傳播體系更加緊密扣合。在此「全球化」的熱潮中，Sparks 的觀點將有助於我們冷靜下來，思考本地文化在全球文化中的定位與自主性。

再次，在國內的傳播權力的分配上，過去台灣的傳播事業受到威權體制的控制，只有少數個人才有機會開報館、設電台（Lin，1997；王振寰，1993）；這些人必須與統治者維持「雇主與侍從的關係」（patron-client relationship：指一種政治上的交換關係，也就是權力較大的統治者將社會上的珍貴資源授予其親信，而親信則忠誠地服從統治者的領導，以做為回報。Scott，1972）。九〇年代政治轉型的過程中，傳播產業歷經了「自由化」（如開放報禁、開放廣播頻道、有線電視合法化）。但是，正如 Sparks 所破解的迷思——自由化與民主化並無必然的關聯，台灣的經驗與 Sparks 所分析的東歐個案比較起來，可能只是「五十步與百步之差」。也就是說，台灣的情況或許比東歐的好一些，但是也沒有落實 Williams（1962）所說「民主的傳播體制」——公眾能掃除掌控媒體的政經勢力，共同享有、並公平使用媒體資源。雖然自由化了，台灣仍由少數的（甚至是同一批的）集團或個人控制大部份的傳播資源（Lin，1997；馮建三，1995），那麼，我們必須深思的是，台灣的執政當局號稱「（我們）…（正）積極推動民主化…」（李登輝，1994a：873）、「…（已）落實政治民主化的理想…」（李登輝，1994b：884），但是，在社會的底層，舊的結構可能並沒有大的改變。果真如此，那麼，Sparks 的作品給我們的另一個啟示是，我們「政治轉型」的意義為何？與社會權力的關係為何？未來的方向又在哪裡？

單單就以上三點而言，我們幾乎可以肯定，Sparks 的針砭之言，不僅擊中傳播界的要害，且能找出盲點。概括地說，Sparks 的思想及分析，一如開啟了一扇知識之窗，從窗中透進清新的空氣，助人發現新的問題，獲致新的看法。

謹以此文，供有心人做為研究 Sparks 教授大作前的導讀。

參考文獻

中文部份

- 王洪鈞（1993）：《我篤信新聞教育》。台北：正中書局。
- 王振寰（1992）：〈廣播電視的控制權〉，澄社編：《解構廣電媒體》。台北：澄社。
- 李登輝（1994a）：〈秉持「日新又新與時俱進」精神力促民主運作早早達到成熟境界〉，收錄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李主席登輝先生重要黨務言論集》。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 李登輝（1994b）：〈貫徹中央決策需黨政關係運作順暢〉，收錄在中國國民黨黨史會編，《李主席登輝先生重要黨務言論集》。台北：中國國民黨黨史會。
- 李瞻（1986）：《新聞學》。台北：三民書局。
- 林麗雲（1999），〈為傳播研究另闢蹊徑？——傳播史研究與研究途徑〉，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1999 學術研討會」，1998 年 6 月 27-29 日。新竹縣關西鎮，統一健康世界俱樂部。
- 陳玉璽（1992）：《依附型的發展》。台北：人間出版社。
- 馮建三（1995）：〈開放電視頻道的政治經學〉，《廣電資本運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唐山，pp.31-65。
- 張錦華（1994）：《傳播批判理論》。台北：黎明書局。
- 程宗明（1998）：〈析論台灣傳播學研究/實務的生產（1949-1980）——從政治經濟學取向思考對比典範的轉向〉，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1998 學術研討會」，1998 年 6 月 29-30 日。台北縣深

坑鄉，新翠谷世新會館。

程宗明（1997）：〈台灣戰後廣播工業的控制與依附研究（1947-1961）——抑制面與管制生產面的收音機產業〉，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1997 學術研討會」，1998 年 6 月 18 日。台北縣深坑鄉，新翠谷世新會館。

劉平君（1999）：〈文化研究的「翻譯」——從英國到台灣〉。發表於「中華傳播學會 1999 學術研討會」，1998 年 6 月 27-29 日。新竹縣關西鎮，統一健康世界俱樂部。

盧修一（1989）：《日據時代台灣共產黨史（1928-1932）》。台北：前衛出版社。

英文部份：

Bauman, Z. (1992). *Intimations of Postmodernity*. London: Routledge.

Castells, M. (1996). *The Rise of the Network Society*. 中譯本由夏鑄久等合譯（1998）：《網絡社會之崛起》。台北：唐山。

Collins, R. et al. (eds.) (1986)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Curran, J. (1978). *The British Press : a Manifesto*. London: Macmillan.

Curran, J. (1991). *Rethinking the Media as a Public Sphere*. In Sparks, C. et al. (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London: Routledge.

Curran, J. and Seaton, J. (1997). *Power Without Responsibility*. London: Routledge.

Fiske, J. (1989). *Understanding Popular Culture*. London: Unwin Hyman.

Fukuyama, F.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London: Penguin.

- Garnham, N. (1986). Contribution to a Political Economy of Mass-Communication. in Collins,R.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pp.9-32.
- Garnham, N. (1986). The Media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Golding, P. et al.(eds.) Communicating Politic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 Giddens, G. (1973). The Class Structure of the Advanced Societies. New York: Harper Torchbooks.
- Gitlin, T. (1978). Media sociology: the dominant paradigm. Theory and Society. 6:216-53
- Golding, P. and Murdock, G. (1980). Theories of communication and theories of society. In Wilhoit, G.C. (ed.). Mass Communication Review Yearbook. London: Sage.
- Golding, P, and Harris, P. (1997). Introduction. In Golding, P. and Harris, P.(eds.). Beyond Cultural Imperialism: Globalization, Communication and the New International Order. London: Sage.
- Hobsbawm, E. (1994).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Michael Joseph.
- Hall, S. (1986). Cultural Studies: Two Paradigms. in R. Collins et al. (eds.) Media, Culture and Society: a Critical Reader. London: Sage, pp.33-48.
- Hall, S. (1988). The Hard Road to Renewal. London: Verso.
- Hamilton, P.(1992). The enlightenment and the birth of social science. In Hall, S. et al (eds.) Modernity and Its Future. Cambridge: Polity Press.
- Keane, J. (1995) Structural Transformation of the Public Sphere.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1):1-22.
- Lin, L.(1997). The Transformation of Press-State Relationships in Taiwan:1945-1995.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 Mills, C. W. (1963). *The Power Elit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Robertson, R. (1992). *Globalization: Social Theory and Global Culture*. London: Sage.
- Scannell, P. (1991). *Broadcast Talks*. London: Sage.
- Scannell, P. (1992).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d Modern Public Life*. In Scannell, P. et al. (eds.). *Culture and Power*. London: Sage.
- Scannell, P. et al. (eds.)(1992). *Culture and Power*. London: Sage.
- Scharmm, W. et al. (1963). *Four Theories of the Pres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 Schiller, H.(1976).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White Plain, N. Y.: International Art and Sciences Press.
- Scott, J. (1972). *Patron-Client Politics and Political Change in Southeast Asia*.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66(1): 91-113.
- Simpson C. (1994). *The Science of Coercion* Oxford: the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parks, C. (1991). *Goodbye, Hildy Johnson: the Vanishing 'Serious Press'*. In Sparks, C. et al.(eds.) *Communication and Citizenship*. London: Routledge, pp.58-74.
- Sparks, C. (1992a). *The Popular Press and Political Democracy*. In Scannell, P. et al. (eds.). *Culture and Power*. London: Sage, pp.278-292.
- Sparks, C.(1992b). *Popular Journalism: Theories and Practice*. In Sparks, C. et al. (eds.) *Journalism and Popular Culture*. London: Sage, pp.24-44.
- Sparks, C. (1994). *Civil Society and Information Society as Guarantors of Progress*. In Splichal, S. et al. (eds.) *Information Society and*

- Civil Society. West Lafayette, Indiana: Purdue University Press, pp.21-49.
- Sparks, C. (1998a). Communism, Capitalism and the Mass Media. London: Sage.
- Sparks, C. (1998b). Beyond National Politics: the Emergence of a Global Public Sphere? Research Paper Presented at The Seminar on the Production and Consumption of National and Local Cultural Products in the Age of Global Communication. Graduate School of Telecommunications, National Chung-Cheng University.
- Sparks, C. (1998c) : 〈全球的傳播，全球的權力：國際傳播理論的再思考與再建構（上）〉，《當代》，第136期。
- Sparks, C. (1999) : 〈全球的傳播，全球的權力：國際傳播理論的再思考與再建構（下）〉，《當代》，第137期。
- Turner, G. (1996). British Cultural Studies: an introduction 中譯本由唐維敏譯（1998）：《英國文化研究導論》。台北：亞太出版社。
- Wallerstein, I. (1976). The Modern World Syste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 Waters, M. (1995). Globalization. London: Routledge.
- Williams, R. (1962). Communications. London: Penguin.

一 般 論 述

